

書林隨緣錄

● 俞筱堯 著

● 沈芝盈 編

書林隨緣錄

俞 筱 堯 著
沈 芝 盈 編

中 華 書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林随缘录/俞筱尧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ISBN 7-101-03243-5

I. 书… II. 俞… III. 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史料
IV. F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4806 号

书名题签: 庞书田

责任编辑: 冯宝志

书 林 随 缘 录

俞筱尧 著

沈芝盈 编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1¼ 印张·2 插页·448 千字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46.00 元

ISBN 7—101—03243—5/I·420



俞筱尧像 1979年 日本东京



1948年 山东潍坊



1949年 北京



与夫人沈芝盈

1953年 上海



与夫人沈芝盈

1993年 北京

序

金 冲 及

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研究工作中，我常觉得对出版史的研究实在太不重视了，这是不应该的。

其实在实际生活中，谁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出版工作对整个社会生活以至历史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一个人从童稚时期起逐渐掌握人类社会长期积累下来的方方面面的基本知识，不就需要依靠出版机构提供的各种教科书吗？我国那些历史悠久的大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早期都以很大力量从事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作。语言大师叶圣陶主持创办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更是新中国从事教科书编审出版的专业机构。随着人们年龄增长、渴望汲取各种新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时，就更离不开出版机构提供的大量书籍了。这些，对整个国民精神文化素质的养成和嬗变，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报纸和刊物在这方面都有各自的作用，但它们终究受到篇幅的限制，无法满足人们进一步求知的需要。因此，出版机构的地位和功能依然不可替代，何况不少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期刊也是由这些出版机构出版的。

出版事业的历史又可以看作历史的一面镜子。它是历史的产物。就拿本书作者曾经工作过而在书中谈得比较多的中

2 书林随缘录

华书局、新知书店、文物出版社来说：中华书局是辛亥革命和民国创立的产物，它名称中的“中华”两字就表明了这一点；新知书店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人们渴望寻求新知的产物，它名称中的“新知”两字同样表明了这一点；至于文物出版社创办和中华书局把工作重点集中到古籍整理出版上来，都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又是新中国诞生后文化建设高潮逐步兴起的体现。它们都是历史的一部分。不仅如此。许多重要书籍的出版，又在先进文化传播和时代思潮演变进程中刻下了自己不可磨灭的印记。如本书中谈到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王亚南和郭大力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和梅益翻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产生的巨大社会影响，都已为众所周知。

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它们理应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文化史上占有值得重视的一席之地。

也许人们对许多书籍以至它们的作者并没有忘却。但在它的背后，这些书籍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中得到出版，许多出版工作者当年是怎样历尽辛劳、策划和组织这些书籍的出版、并把它送到读者手中的，却常常不为人所知。甚至在文化史的著作中，也很少提到这些出版家的名字和业绩。尽管他们自己本来就没有想到过这些，甘心默默地“为他人作嫁衣裳”，但从对历史负责来说，这是不公正的。而且，缺少出版工作这个侧面，写出来的文化史严格说是不完整的。这是一个应该认真加以填补的“空白”，至少是应该认真加以充实的薄弱环节。

我和筱尧同志相交 30 年，共事 10 年，对他有相当的了

解。他在1947年初,也就是他18岁的时候,为了人民解放事业,毅然抛弃在南京国立第一临时中学的学业,投奔到家乡的新四军浙东纵队(通常仍称为三五支队),经历过残酷的游击战争考验。后来因为环境的缘故,转移到上海新知书店工作。1948年,进入解放区。1953年,转调到中华书局。“文化大革命”后,又调到文物出版社。具体岗位虽几经变动,却始终在出版界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出版界风风雨雨的岁月,他亲身经历过,有着切身的感受。他又是个有心人,一直勤于搜集出版工作的史料,并且经常访问他所熟识的许多老一辈出版家。离休后,他执着地、孜孜不倦地先后写出几十篇有关出版界历史的文章,对谈到的事情常向其他当事人认真核对。这真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许多事如果现在不及时抓紧去做,后人也许就难以弄清楚了。这些文章过去分散地发表在各处,读者查阅起来并不方便。现在,中华书局请作者将文章结集出版。我希望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帮助后来的读者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曾经有过那么一大批为祖国文化事业默默奉献、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的出版家,他们是怎样工作的,并且能有助于推动出版史这个不应该被忽视的领域的研究工作。

2002年4月22日

目 录

序.....	金冲及
爱国教育家和出版家陆费伯鸿.....	(1)
陆费伯鸿与中华书局.....	(9)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中华书局.....	(86)
齐燕铭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贡献.....	(119)
金灿然和中华书局.....	(144)
教育家和编辑家傅彬然.....	(167)
出版家和出版史家张静庐.....	(176)
宋云彬文化苦旅六十年.....	(195)
古文献学家杨伯峻的学术道路.....	(218)
版本目录学家陈乃乾.....	(237)
教员·编辑·历算专家曾次亮.....	(259)
为书辛苦为书忙	
——出版家华昌泗.....	(272)
韬奋的“梦”.....	(280)
从《生活》周刊到《大众生活》	
——韬奋主编的刊物和报纸.....	(287)
经济学家和出版家徐雪寒.....	(309)

2 书林随缘录

社会活动家和出版家黄洛峰…………… (341)

实事求是 不倦追求

——记老出版家华应申和王益…………… (365)

勇于开拓的老出版家沈静芷…………… (377)

为出版事业鞠躬尽瘁——出版家毕青…………… (393)

“一日留人间,莫把光阴负”

——怀念曾霞初…………… (411)

辛勤耕耘的戴琇虹…………… (416)

范文澜与《中国通史简编》…………… (423)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梅益译本…………… (434)

解放战争时期的新知书店…………… (441)

书店生活漫说

忠魂昭千古…………… (461)

堡垒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466)

珍惜与怀念…………… (472)

鱼水情深话当年…………… (474)

怀念邱文崑…………… (477)

要为文化作干城

——谈谈《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 (480)

严谨治学 不断求真

——陈援庵诞辰 110 周年…………… (486)

语言大师叶圣陶…………… (494)

甘为后人作便桥 长留正气在人间

——纪念杜国庠逝世四十周年…………… (511)

一代儒将郭化若二三事…………… (534)

延安书坛的一段历史佳话

——从《郭化若书法集》说起…………… (548)

王一飞早期的革命活动…………… (556)

光明在望

——一次激动人心的旅行…………… (579)

照人肝胆情犹昔 共欣文史得津梁

——郑振铎诞辰 100 周年和殉难 40 周年…………… (584)

郑振铎珍惜人才散记…………… (618)

徐平羽抢救敦煌莫高窟记闻…………… (622)

积极进取的老出版家王仿子…………… (632)

文物摄影艺术家彭华士…………… (645)

在文物出版社十八年…………… (654)

编后记…………… 沈芝盈 (687)

爱国教育家和出版家

陆费伯鸿

说起陆费伯鸿先生（1886.9—1941.7），很多人已经生疏了。近年来，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一套《中国近代教育家论著丛书》，所列蔡元培、胡适、陶行知等二十四位教育家中，就有《陆费逵教育论著选》。

陆费伯鸿名逵，号少沧，伯鸿是他的字，人多称伯鸿先生。陆费是复姓。据他自己说，祖上姓费，在明代从山东费县迁居浙江桐乡，过继给舅家陆姓为嗣，后来费家也没有子嗣，便兼祧两家，复姓陆费。

陆费伯鸿祖上有陆费墀者，在清乾隆年间曾以翰林院编修任《四库全书》总校官，后又任副总裁，凡二十年，几与《四库全书》的纂修相终始，可以说是一位编辑大家了。陆费伯鸿对陆费墀所从事的事业十分向往。他的父亲陆费芷沧，游宦陕西汉中，后又改入江西府幕。他生在汉中，长在南昌。从小由母亲教读识字，读过《唐诗三百首》、《纲鉴》、《四书》、《诗经》和《左传》等书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陆费伯鸿在思想上受

2 书林随缘录

到很大震动：日本明治维新，不到三十年而由弱变强，船坚炮利，社会制度也比中国先进。而中国却国势日益不振。他以为能否真正讲求西学或新学，是振兴中华的头等大事。他阅读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开始自习常识、地理和数学等新知识，后来又严复弟子所设的熊氏英文学塾附设的日文专修科学习日文。由于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见解新颖，很受教师吕烈煌的器重。

1903年，陆费伯鸿到了武昌，次年与友人集资开办新学界书店，自任经理，销售《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刊。他还写了一部《岳武穆传》（稿本），抒发爱国的思想感情。其时，革命党人刘静庵，假基督教圣公会阅报室——日知会，从事革命活动，宣传革命道理和发展革命组织。陆费伯鸿参加了日知会，曾起草日知会章程，并被选任日知会评议员。

1905年秋，他辞去新学界书店经理，与日知会会员张汉杰、冯特民等接办《楚报》。由张汉杰主办，他和冯特民同任主笔与记者，撰写时评，纵论国家大事和湖北政治。后以揭露和反对粤汉铁路借款密约，针对清政府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被炸事，批评“预备立宪”之举无济于事，湖广总督张之洞以鼓吹“革命罪”，将报馆查封，张汉杰被捕，陆费伯



陆费逵(第二排左3)和武昌

日知会干部合影 1905年

鸿逃亡上海。他本拟赴日学习,以经济困难未能成行,遂应昌明书店之请,担任该店上海支店经理兼编辑员。同年冬,文明书局请他襄助经理办事并兼编辑员。他与俞复等编著文明教科书,很受教育界欢迎。但以资金短绌,没有能够继续下去。

1908年秋,陆费伯鸿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任国文部编辑员。次年春任出版部长、交通部长兼师范主任。当时他以改革教育和传播新学为己任。1909年2月,商务印书馆创办《教育杂志》(月刊),他担任主编。他在《教育杂志》及在《申报》、《南方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许多论文,积极鼓吹教育改革,简化汉字,反对读经,着意于培养人才,开发民智。有人主张“保存国粹”或“全盘西化”,他都表示反对。在1905年所撰的《论日本废弃汉文》等文中,他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对汉文典籍常旁注拼音,同时推行拼音文字的办法十分赞赏。他认为“文化之进退,率视文字之繁简为比例差”。他在回顾了西方列强强迫殖民地人民使用宗主国语言等不平等状况后,曾明确指出:“吾愿我国讲改革讲西学者,勿自亡其粹以亡其国也;又勿徒保其粹而不图进化也。”他对日本学习西方而又能维护日本的文化传统,致国家于富强之途十分推崇,中国应当效法。

陆费伯鸿曾经说过:“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上海市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1924)

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陆费伯鸿即创办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中华教科书》,这套书开我国共和教科书的先河。在《申报》等报刊上发表的《中华书局宣言书》上,陆费伯鸿公开宣

4 书林随缘录

告：民国成立“从此民约之说，弥漫昌明；自由之花，裔皇灿烂，……”。中华书局的创办宗旨为：“一、养成中华共和国民；二、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意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他对推翻帝制建立的民国抱有很大希望，也没有忘记他所一贯倡导的以教育为根本的主张。他主持中华书局整整三十年，编辑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书刊，为传播文化知识、促进我国的近代化进程作出了贡献。

1919年，北京爆发“五四”爱国学生运动，随之，上海和各地纷起响应。陆费伯鸿在《中华教育界》第八卷第一期发表《学界风潮感言》，他把学生的爱国运动，比喻作汉代郭泰、北宋陈东和明代东林为代表的爱国正义力量，赞赏青年一代和工商各界“均能知世界大势”，而又有“合群之力”和“有秩序之行动”，“不复如前之一盘散沙”。并认为“国民爱国之精神，团结之巩固”，“为立国不可少之条件”，对“我国民程度如是之高，殊出人意料之外”。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我国社会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高潮。当时周宪文应聘在中华书局任编辑，陆费伯鸿想用“中国和中国人”作为名称创办刊物，和周宪文商量，周宪文理解他“用心良苦”，因为中华书局在民国初年出过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月刊），建议刊物名称为《新中华》，也同样包含这层意思。陆费伯鸿接受了这个建议，《新中华》在1933年1月以半月刊的形式正式创刊了。《新中华》最初由周宪文、钱歌川、倪文宙主持编辑，设有论著、文艺、谭薮、新刊介绍、讽刺漫画、时论摘粹、半月要闻、通讯等栏目。经常撰稿人有陈望道、李石岑、钱亦石、章伯钧、梅龚彬、王亚南、何思敬、胡乔

木、钱俊瑞、薛暮桥、沈志远、千家驹等。在创刊号上,陆费伯鸿发表《备战》一文,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太平洋风云变幻,一天紧似一天,第二次世界大战势所难免,中日两国全面战争一触即发。一旦战起,中国以弱国对强敌,要准备长期作战,才能取胜。他大声疾呼:必须停办一切不急之务,集中全国财力人力,“快快备战”。对建设空军、武器弹药和汽油等军需物资的准备,粮食的储存、交通设施的修筑和运用,以及后方工作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致对外”的主张,认为“多难兴邦”,对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1932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成立伪满洲国,他在该刊第一卷第二期又发表《东三省热河为我国领土考》一文,根据大量历史文献证明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为中国固有领土。为帮助青少年正确认识历史,陆费伯鸿还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小朋友》周刊,特地编辑“提倡国货”、“抗日救国”和“淞沪战事记略”等专刊。

陆费伯鸿对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早有觉察,还在1924年,中华书局就着手出版《国民外交小丛书》;1932年又有《国际丛书》、《东北研究丛书》和《东北小丛书》的编印。《国民外交小丛书》共出版十余种,对近代国际关系特别是中日关系、美日关系、帝国主义的领事裁判权和门户开放政策等,作了介绍和分析,激励广大读者都来关心国家大事。《国际丛书》共约三十种,有刘炳藜等编译《苏俄经济生活》、董之学编《世界殖民地运动》、沈志远著《世界经济危机》、张明养著《国际裁军问题》、朱在勤编著《列强军备概况》、王亚南著《现代外交与国际关系》、张永懋著《日美关系略史》、梅剑文著

《太平洋上的争霸战》等。《东北研究丛书》和《东北小丛书》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阴谋和东北的社会、金融、铁路、矿产、贸易、农业等状况，以及对“满铁”的真相，作了解剖和分析。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起，又陆续出版了《淞沪抗日战事始末》、《淞沪御日战史》（正续编）和《“一·二八”淞沪抗日之役庙行镇战记》等。1937年“八一三”事变，上海沦陷，又出版了《中日的旧恨和新仇》、《沦陷后的上海》等。在此之前，还出版了《五卅·六一惨案》英文版，向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广为传播。这些书籍向广大读者宣传国际形势，揭露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罪行，维护民族尊严、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显然是很必要的。

陆费伯鸿还十分讲求出版物的印刷质量，认为“印刷为文明利器，一国之文化系焉。果使我们印刷放一异采，不徒为我局实力之发展，亦足以观国民文化之进步”。（《中华书局五年概况》，1916）中华书局创办不久，1914年他已着手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购置地皮四十三亩，于1916年建成厂房二层楼房五幢，平房四幢，共约五百间，并添建了货栈。后在1924年扩建、添建二层楼房二十五幢和三层楼房三幢，分别作为装订、图版栈房、新添轮转机房和印刷所办公室之用。“一·二八”之后，在闸北一带的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印刷厂，遭日本侵略者的肆意破坏和焚毁，损失惨重，他决定将印刷厂分散经营，几次亲自赴香港实地勘察，于1934年在香港建厂，占地十七亩。次年又在上海澳门路购置地皮十二亩建厂。在此期间，从日本和德国购置四色凹印轮转机、双色胶印机、制版机等新式设备，还聘请了德籍和日籍技师。中华书